

《孔丛子》与秦汉子书 学术传统

孙少华◎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孔丛子》与秦汉子书 学术传统

孙少华◎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孔丛子》与秦汉子书学术传统/孙少华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5. 10

ISBN 978-7-5161-6541-6

I. ①孔… II. ①孙… III. ①杂家②《孔丛子》—研究

IV. ①B229.3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59997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选题策划 郭晓鸿
责任编辑 熊 瑞
责任校对 邓雨婷
责任印制 戴 宽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84083685
门 市 部 010-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5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21
插 页 2
字 数 336 千字
定 价 7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资助项目（10CZW021）优秀结项成果

自序

对《孔丛子》的整理与研究，目前除了笔者的《孔丛子研究》、傅亚庶的《孔丛子校释》和数篇硕士论文，系统综合的整理与研究成果尚不多见。虽然最近也陆续出现了一些考证时代与作者的论文，但大多还囿于真伪、“疑古”的考证俗见，未能将此类研究上升到学术传统的高度，进行宏观审视与客观考察。其实，我们完全可以跳出真伪争辩的窠臼，将具有相同学术思想与文化传统的作品，放在同一个学术背景下进行系统研究。这样或许会使得僵硬的古代文本鲜活起来，并且具有中华民族学术大一统的意义。

事实上，中华学术历来是一个系统、完整的思想体系，人为将其割裂，必然会造成学术思想的混乱与门派之争。中国古代文本中文献资料复杂性的产生，主要与此有关。例如，先秦两汉诸子研究，历来在文献材料的选择与使用上存在很大矛盾。这并非出于研究者自身的原因，而是诸子文献内在的矛盾性使然。如果从传统的“辨伪”、“疑古”角度无法彻底解决问题的时候，我们就需要转换思路，从更为形而上的层面——例如“学术传统”的层面，思考中国古书存在的“真伪”问题。

先秦两汉诸子文献，具有两个特性，一是“丰富性”，二是“有限性”。所谓“丰富性”，是说先秦两汉诸子存在丰富的文献资料，尤其是先秦诸子的百家争鸣，造成了古代文献的大量堆积与层累，在诸子各家甚至本门派的著作中，都存在或雷同或矛盾的材料，并且情况相当严重。所谓“有限性”，是说当时知识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并非所有诸子都能随意

看到原始文献，这就决定了他们不得不利用其他诸子发现、提出的话题展开辩论，在编纂、撰述的时候，他们也需要从共同的“话题材料”与“文献资源”中采集文献。这就造成了先秦诸子文献的“公共资源性”问题，同时也会使得诸子百家著书立说时需要遵循当时社会的学术规定。同一学派，在不同时代会具有思想一致的“学术传统”；不同学派，在同一时代也会遵循大体一致的“学术规范”。其中，既有综合各家各派的“大传统”，也有专属一家、一派的“小传统”。这为我们通过一部专著去考察秦汉子书的学术传统提供了可能。

初步成书于秦汉之际的《孔丛子》，出于众手，且在汉代又有续编。该书体现的文献性质与编纂思想，大致可以反映先秦两汉子书的学术传统。《孔丛子》的材料，时间跨度由战国至东汉，其材料与先秦两汉子书的“互见性”，使得该书不仅可以为我们提供不同时代的学术信息，而且能够呈现出它与不同时代子书的学术共性。以《孔丛子》为基础，我们可以从撰述、叙事、家学、文体、文学思想等各方面，揭示秦汉子书的“学术传统”问题。

对比《孔丛子》与先秦两汉子书的文献记载，很容易发现它们之间具有大量的材料雷同。从另一种角度看，这种材料雷同特征，足以让我们认识到《孔丛子》从“旧思想”中采撷“文献精华”为其所用的目的与方法、其他子书与《孔丛子》相同材料在各自表述上产生的共性与差异性问题。

就先秦子书而言，《孔丛子》与之具有雷同材料的著作，儒家有《论语》、《孔子家语》、《孟子》、《荀子》等，法家有《管子》、《韩非子》等，道家有《子华子》、《文子》、《亢仓子》、《慎子》、《列子》等，杂家有《尸子》、《吕氏春秋》等，名家有《邓析子》、《公孙龙子》等。它们之间的学术联系，体现出了一定的“学术共性”：《孔丛子》与《论语》、《孔子家语》的学术联系，可以看出它们具有“集体记忆”与“集体叙述”的家学特征；与法家著作的学术联系，体现了它们对“入世”与“时移世易”的共同思考；与墨家的学术联系，则体现了它们在互相攻讦中又有共同的编纂风格与学术特性；与道家、名家的学术联系，则体现出它们在共同的学术背景中对社会思潮产生了相同的思考。

就汉代子书而言,《孔丛子》与之具有雷同材料的著作,西汉主要集中在《尚书大传》、《韩诗外传》、《淮南子》、《说苑》、《新序》、《法言》等,东汉主要集中在《白虎通》、《论衡》等。这些著作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很多材料多来源于先秦,如《尚书大传》、《韩诗外传》、《淮南子》、《说苑》、《新序》的取材,主要是先秦古书;《白虎通》、《论衡》记载的,多是先秦传说与故事。这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孔丛子》的学术特征:大多记载先秦“传闻异辞”。

《孔丛子》以及其他秦汉子书,与先秦子书同类材料在表述上也有很大差异。这种差异,与“真伪”无关,却与文献材料选择、使用的时代性与思想性有关。秦汉子书大致遵循类似的学术共性。这种学术特征,说明《孔丛子》与秦汉子书在继承先秦“旧传统”基础上,也有对秦汉学术“新传统”的创造。也就是说,在成书过程中,《孔丛子》与其他秦汉子书采用了直接援引先秦“旧文献”、改造“旧文献”以适用于当时学术之需要两种方法。这实际上就是陆贾《新语》所言“善言古者合之于今,能述远者考之于近”。概而言之,就是“言古”与“合今”、“述远”与“考近”:前者是继承先秦子书学术思想,学习“旧传统”优秀元素的过程;后者是将先秦诸子思想转化为符合秦汉诸子学术需要的新材料,并重新编纂、整理出来,创造“新传统”的过程。按照今天的说法,“言古”与“合今”、“述远”与“考近”,不仅是当时秦汉诸子著书立说的“学术原则”,也是他们为后世创造的一种“学术传统”,因此具有方法论意义。这也是后来历代学术研究大致遵循的基本思想与方法,并相沿成习。中华民族的“学统”与“文脉”,之所以绵延数千年而不绝,其根源也在于此。我们今天的学术创新,也需要从这两个思路出发,展开研究。

问题的提出,与“疑古派”对诸子文献的辨伪有关。古籍辨伪,确实是“读书第一义”(姚际恒《古今伪书考序》)。但是,如果过度纠缠于“真伪之争”,很容易忽视中国古代的学术传统,并对中国传统文化造成戕害。客观上来说,“疑古派”为我们深入认识先秦两汉诸子思想提供了新方法、新思路。但毋庸置疑的是,“疑古派”造成的学术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过分“疑古”,造成了研究者面对诸子文献时往往产生首鼠两端、无所适从的心理。同一则材料,诸子记载各有不同。“疑古派”往往通过

史源学的对比分析，力图“去伪存真”，从中选择一个看似符合当时历史实际情况的“真说”，其他的则被视作“伪说”。这种做法，看似没有问题，实际上造成了很大的研究困境：中国古代很多被认定为“伪”的文献，会被轻率地“切割”出去，并使研究者对中国古代所有的文献记载产生怀疑，进而造成对中国古代学术研究基石的抽离，严重一点，还会使研究者作出中国古代学术典籍“文本不可靠”的判断，从而对华夏文明的根源与传统造成戕害。这就有点过犹不及了。

如果考虑到中国悠久的学术传统，尤其是考虑到华夏文明与中国学术具有内在的“学统”、“文脉”的话，这种“去伪存真”就存在很大问题。道理很简单，先秦两汉诸子文献具有“公共资源性”特征，各书材料之间存在雷同或差异，都是常事。诸子百家对同一则材料记载的“差异性”，不能简单以谁是谁非来衡量，而要考虑到不同学派在同一场合或相同学派在不同场合材料表述的差异性。结合秦汉诸子学术传统的认识，我们或者可以对“疑古派”的一些说法进行重新审视，甚至对传统学术的研究方法进行反思。

就秦汉子书而言，其“言古”与“合今”、“述远”与“考近”，包含了继承与创新两个层面的东西，具有“学术传统”的理论价值。这成为笔者由子书入手考察秦汉子书学术传统的基本依据。同时，只有秦汉子书，才能与此前的先秦子书产生学术联系，并具备学术上的可比性，从而考察二者之间的古今、远近、新旧以及变与不变之关系。另外，本书以之为研究中心的《孔丛子》，其主要成书大致在秦汉之际。诸如此类的原因，笔者把研究时间界定在“秦汉”。

希望这种尝试，能为先秦两汉子书研究提供一点新思考。

乙未春日于北京

绪 论

先秦两汉诸子，皆有其内在学术传统。墨分为三、儒分为八，其持守各有不同，但其撰述皆有一贯之思想、共同之传统。也就是说，秦汉子书撰述，不同时代有其特殊的学术要求与社会规范。尤其是，由于子书成书，存在后世续写、编纂的情况，有些子书，由于材料来源较早，编纂时代较晚，就可能体现不同时代的学术风尚、编纂或撰写风格。由此出发，我们就可能考察不同时代的子书情况。即以汉代诸子为例，从陆贾、贾谊、刘向、扬雄、刘歆、桓谭，皆有以“新”为名的著作，体现了鲜明的“尚新”传统。^① 并且他们的著作，皆自比孔子《春秋》，体现了汉代诸子的《春秋》学意识。这都是可以感知的“传统”。

根据汉代诸子的《新语》、《新书》、《新序》、《新论》等观念分析，汉代诸子意图创建一种不同于先秦的“新思想”、“新体系”或“新传统”。这种意识是非常明显的。以秦汉诸子著作为例，完全可以考察当时的学术传统与文学风尚。

《孔丛子》中的文献资料，多见于先秦两汉典籍记载，故此书最后成书虽晚，但其中不乏大量真实的文献资料。该书记载孔氏人物众多，历史跨度较长，说明本书的作者、编纂者并非一人，但前六卷由秦汉之际的孔鲋最后整理成帙、最后一卷由孔季彦之子一辈最后整理，则为事实。^② 从这里说来，《孔丛子》的成书过程，体现着不同时代的学术特征与编撰风

① 孙少华：《西汉诸子的“尚新”传统与“新学”渊源》，《文学评论》2012年第2期。

② 孙少华：《孔丛子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64页。

尚，从而使该书有可能成为研究中国古代学术尤其是秦汉诸子学术传统的参照物。

《孔丛子》记事从孔子至其二十代孙孔季彦，跨代四百余年，与先秦两汉子书材料多有雷同。例如，《孔丛子》记子思，与先秦其他典籍如《文子》、《邓析子》、《子华子》、《慎子》、《尸子》等，皆有雷同；记载子高的材料，与三《礼》、《孟子》、《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等多有雷同；《孔丛子·嘉言》的很多材料可见于《吕氏春秋》、《尚书大传》或《说苑》，等等。这些雷同材料的出现，可能有三个原因：

第一，同一学派递相传承本学派的文献材料（属于“旧思想”的流传与继承）；

第二，不同学派对共同关注的材料各自引用（属于对“旧传统”的遵守）；

第三，不同学派在攻讦另一学派的时候，直接将对方的文献转录于本派书中。

这些雷同材料的出现，至少说明两个事实：

第一，这些雷同材料，出现在不同时代的子书中，说明它们能够体现不同时代诸子的学术共识或者争议，从相同或不同角度进行了解读与阐释，故能被历代子书反复引用。

第二，不同时代同一学派的诸子，有着内在的学术思想传承，具有一定的学术传统，所以他们能够将相同的材料转录在本派著作中，并不断继承与传播，说明这些子书的撰写、编纂遵循本派特定的学术传统。

诸如此类，足以说明，先秦两汉时期，诸子百家对撰述时文献的选用并无严格的门户之见，他们关注的是自己著作中体现的思想、意旨。更为重要的是，先秦时期由于知识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当时不可能有丰富的文献供诸子百家随意采撷与使用。这种文献资源的“有限性”，就决定了它们在诸子百家撰述、编纂子书时的“公共资源性”。这样，他们在编纂、撰述的时候，就需要面对共同的“话题材料”与“文献资源”，遵循当时社会的学术规定。尤其是，同一学派的书籍，在不同时代，一定存在内在的“学术传统”。其中，既有综合各家的“大传统”，也有专属一家、一门的“小传统”。正如笔者所言：

对于古代文学研究而言，所谓“传统”，应该有两个层面的意思：一个是综合文史哲各学科、符合中国传统文化特质的“大传统”，另一个就是中国古代文学学科内部的，符合“文学文本”发生、发展规律的“小传统”。……中国学术与文学，历来讲究学术“大传统”。先秦两汉学术与文学，尤其如此。所谓“大传统”，用汉人的话来说，就是文章体现的“万类、王政、人事、法度”，或者概括为“天道”、“人事”，这是先唐学术与文学所要表达的主要内容，即将学术、文学作为传达个人理想，或民族、社会与国家思想、意志的工具。^①

中国古代学术，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也具有内在的、一以贯之的撰写、编纂的思想“传统”，既然如此，这就为我们通过一部专著，去考察秦汉诸子的学术传统，提供了可能。

《孔丛子》体现的学术风尚与撰写、编纂体例，是对先秦两汉诸子学术传统的反映。我们有理由以《孔丛子》为例，在研究其文献价值及其与先秦两汉子书学术共性的基础上，考察秦汉子书的学术传统问题。

笔者的工作分两部分，上编主要对《孔丛子》文本材料进行综合比较，分析它与哪些先秦两汉子书有文献关联。这种对雷同材料的使用，其实预示着《孔丛子》与先秦子书在编纂过程中遵循了一定的“旧思想”与“旧传统”。在《孔丛子研究》一书中，我们也有类似的材料比较研究，但当时主要以《孔丛子》的编纂、撰写为中心，考察编撰者对《孔丛子》文本材料的处理方式，本书着眼点则是由《孔丛子》出发，观察整个诸子撰述对相同材料的使用情况，在使用雷同材料时展现出来的“学术共性”，以及体现出的对先秦“旧思想”与“旧传统”的遵守。我们的观察是有根据的。结合《孔丛子》与《论语》、《孔子家语》的学术联系，我们可以看出它们具有“集体记忆”与“集体叙述”的家学特征；与法家著作的学术联系，则是对“入世”与“时移世易”的共同思考；与墨家的学术联系，则是在互相攻讦中又有共同的编纂风格与学术特性；与道家、名家的学术共性，则是它们处于共同的学术环境、对社会思潮的共同

^① 孙少华：《近十年来先唐文学研究的若干问题》，《文学遗产》2014年第2期。

反映。

上编的材料与方法，我们曾经应用于《孔丛子研究》中，二者的主要区别在于：《孔丛子研究》，是通过比较《孔丛子》与先秦两汉子书的材料雷同，解决《孔丛子》的文本问题，尤其是其真伪问题，重点考察的是二者之“异”；本书的主要向度则与《孔丛子研究》相反，即通过比较《孔丛子》与先秦两汉子书的材料雷同，解决先秦两汉子书包括《孔丛子》采摭雷同材料的方式与目的，从而解决先秦两汉子书的编纂、撰写、叙事体例与传统问题，重点考察二者之“同”；同时，也通过二者之“异”，进一步分析诸子各家在对待相同材料时，解读、使用材料时展现出来的“不同”的学术思想。

下编主要在上编的基础上，揭示秦汉子书的学术“共性”，也就是“学术传统”问题，这个向度涉及《孔丛子》与其他秦汉子书对“新传统”的创建问题。《孔丛子》涉及两汉人物，它与秦汉其他子书在继承先秦“旧传统”基础上，也有对汉代“新传统”建设的思考。我们的工作，就是挖掘出《孔丛子》与秦汉子书继承先秦思想、开创汉代传统的学术探索与价值。在《孔丛子研究》一书中，我们主要解决的是《孔丛子》本身的文学、文化与家学思想问题，在本书中，我们将以《孔丛子》涉及的问题为例，考察秦汉子书体现出的学术传统，以及由此带来的学术风尚与学术影响。在重点结合对秦汉子书如《韩非子》、陆贾《新语》、桓宽《盐铁论》、刘向《说苑》与《新序》、扬雄《法言》等著作的考察基础上，我们对秦汉诸子的撰述传统、叙事传统、“拟圣”传统、文体嬗变与文学影响等，有了一定新的认识。

根据我们的观察，汉代诸子，之所以想努力创建属于自身的学术与文化“传统”，是因为他们具有浓厚的政治参与意识，具有很强的社会责任感与人文精神。他们试图在构建汉代文化精神与传统的基础上，创造属于他们那个时代，尤其是属于“汉代社会”的精神产品。就此而言，深入研究汉代诸子的学术传统，也有其现实意义。

目 录

绪论	(1)
----------	-------

上编 “言古”与“述远”：《孔丛子》与先秦两汉 子书的文献共性

第一章 《孔丛子》与先秦子书的学术传统	(4)
第一节 “集体记忆”与“集体叙述”：“孔氏家学”著作的学术 意义	(4)
第二节 “追远”与“祖武”：《孔丛子》与思、孟、荀的思想共性	(15)
第三节 《孔丛子》与《墨子》之小学关系	(28)
第四节 《孔丛子》与法家的学术联系	(36)
第五节 《孔丛子》与道家、名家的文献关系	(43)
第六节 《孔丛子》与杂家的文献联系	(56)
第七节 《孔丛子》独有之文献	(72)
第二章 《孔丛子》与汉代子书之学术关系	(80)
第一节 《孔丛子》与西汉诸子文献	(80)
第二节 《孔丛子》与东汉诸子文献	(103)

第三章 《孔丛子》与先秦两汉其他典籍的文献关系	(106)
第一节 《孔丛子》与经书、纬书的关系	(106)
第二节 《孔丛子》与先秦两汉史书的文献雷同	(120)
第三节 《孔丛子》与秦汉集部文献的关系	(130)
结论	(135)

下编 “合今”与“考近”：秦汉子书的学术“新传统”

第四章 《孔丛子》的家学思想与秦汉子书的“私淑”传统	(139)
第一节 《孔丛子》“春秋”思想与汉代诸子“春秋学”的建立	(140)
第二节 “西道孔子”扬雄对汉代文化与文风的影响	(146)
第三节 “西道孔子”扬雄对汉代经学的贡献	(162)
第五章 《孔丛子》与秦汉子书的撰述传统	(179)
第一节 诸子著述的思想传统 ——以“廉耻”为中心的考察	(179)
第二节 《韩非子·初见秦》与战国末年古书编纂问题	(193)
第三节 《孔丛子》的子书性质与先秦诸子的学术共性	(200)
第四节 《孔丛子》与秦汉子书的“言经”、“援圣”传统	(217)
第六章 《孔丛子》与秦汉子书的叙事传统	(239)
第一节 史书“故事”与秦汉子书的叙事传统	(240)
第二节 “母题共性”与汉初诸子的叙事传统 ——以《新书》“宦皇帝”为例	(252)
第七章 汉代诸子学术与文学传统的思想基础	(273)
第一节 汉代诸子学术与文学传统的社会基础 ——以《盐铁论》为中心	(273)
第二节 汉代诸子文学传统的内部因素 ——以骈散分途为中心	(294)

结语 《孔丛子》与秦汉子书学术传统的思考	(312)
参考文献	(316)
后记	(318)

上 编

“言古”与“述远”：《孔丛子》
与先秦两汉子书的文献共性

《孔丛子》记事所涉及的时代、人物较多，材料驳杂，与先秦两汉古书中的材料多有雷同，此为后人攻讦其为伪造之最大口实。但从另一个方面看，这却是研究《孔丛子》与先秦两汉子书关系的最好切入点。具体做法就是：将《孔丛子》与其他子书相同或相似的材料放在一起进行比对、分析，从材料来源、叙事异同、文字差异等角度，考察它们之间的源流与衍变。这种研究，不仅解决的是《孔丛子》本身的材料问题，还可以反过来考察这种“雷同材料”带来的诸子著作中的“学术共性”问题。

为什么采用看似比较“笨拙”的逐段分析的方法呢？这是因为，我们既然已经比较全面地占有了材料，当然需要对这些材料进行深入的分析与引申。但是，如果不做整体的考察和深入的研究，而只是抓住全书的只言片语或个别典型段落，用寻章摘句、断章取义的方式来代表和解释全书内容，即使这种方式采用了看似严密的考证来说明丰富的内容，其结论也只能是牵强附会、似是而非的。^①事实上，《孔丛子》记载的人物不一、材料复杂，何况同一段材料中，有时也有差异。对此，我们只能采用逐段分析的方法。这是与先秦子书成于众手的编纂与撰写方式有关。郑良树先生就在此学术风尚基础上推论说：“我们对先秦诸子的研究，特别是对真伪的研究，就必须采取一种新的态度——以篇为单位，甚至以段为单位，逐段逐篇考订及观察，而不是过去那种以书为单位的方式了。”^②

本编所用方法，实以比较为主。“比较从来都是分析问题的一个基本方法。”^③比较的方法，可以帮助我们具体细致地认识材料之间的关系，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考察产生这些联系或差异的原因。当然，我们还要注意这种方法存在的不足之处，正如樊骏先生所说：“即使表面看来相似或者接近的现象，也总是包含着或隐蔽或者明显的区别。”要完全回避这个问题，可能对我们来说难度很大，但我们将尽其所能，在尽量客观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挖掘各材料背后隐藏的信息。

当然，正如郑良树所言：“古籍既然是有生命的机体，有新陈代谢的

① 樊骏：《新民主主义理论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102页。

② 郑良树：《诸子著作年代考·后记》，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1年版，第276页。

③ 樊骏：《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考察和思索》，《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第42页。